

责任编辑:徐香花

抗战时期空中打击力量的建设及其重要历史价值

□ 温玉堂 王伟 孔宪东

2008年是中国抗日战争胜利63周年。倘若我们以8月14日日本天皇正式颁布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作为中国人民抗战胜利纪念日的話,这一天恰好是中国空军的“空军节”,是抗战时期中国空军统一建制后第一次升空与外敌作战并取得重大胜利的纪念日。我们认真研究这一时期中国空军的力量建设和使用,对今天处在新军事变革中的人民空军来说,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价值。

日本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加紧侵占中国东北的同时,次年1月28日,又以“日本僧人被殴打事件”为借口,打着“保护日侨”的旗号在上海发动了战争。与九一八事变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此次中国军队不仅进行了英勇抵抗,而且未编成军的中国航空队也壮怀激烈,作了最大牺牲。

在这次空中战场的较量中,日本空军^①配合地面部队进攻投入了300多架战机,而中国参战的只有军政部航空署属下的第2、第6、第7航空队等各型飞机32架。这次空战,尽管中国航空队飞行员满腔怒火,积极作战,但也暴露了中国空军武器装备落后,战斗技术不高,勤务保障薄弱等诸多问题。此次战役4个航空队共出动飞机35架次,参战飞行员45人次,虽击落敌机两架,但按比例计算,中国空军的损失更大一些,共有3架飞机被击落,5名飞行员牺牲和负伤。一·二八淞沪会战呼唤着中国空军尽快地成长和强大起来。

就日军空中力量的使用而言,淞沪会战实际上是日本空军对中国空军实力的一次“火力侦察”。这以后,日本加快了空军建设的步伐。到1937年,日本陆军装备飞机1000架,海军装备飞机1200架。况且日本工业基础雄厚坚实,完全有能力在作战消耗之后迅速生产出三菱A5M96式、A4N95式舰载战斗机和B4Y96式舰载鱼雷攻击机以及三菱G3M96式轰炸机等各种全金属、性能优的战机来加以补充。所以,从空军武器装备说,日本已经有足够的战机可以对地面部队实施支援。与此同时,日本还加强了对飞行人员的战术技术训练和武士道精神的教育,加强了空军指挥能力和战斗能力的培养。

日本空军的上述准备,无疑引起了国民政府的严密注意。为落实第2届中华航空协进会制定的要在6年之内建成一支强大的中国空军的宏伟计划,^②国民政府一是发行“航空奖券”,为中国空军购买飞机筹集资金,从1933年到1936年,共发行30期,每期500万元,总数在1亿元以上;二是发起“统一航空运动”,为中国空军的战力整合奠定基础。到1937年8·14空战前夕,湖南、东北、云南、广东、山西等地方航空队先后更幡易帜,自觉接受国民政府的整编,体现出了中国军人面对外国入侵,维护国家主权和独立的共有的核心价值。

1936年6月1日,西南执行部和西南政务委员会在中国军队积极抗日的感召下,呈文国民政府,吁请抗日。次日又通电全国,坚决要求“北上抗日,收复失地。”国民政府利用此一机会,亦加紧了政治攻势,直接促成了广东空军于7月18日74架飞机集体“北上”(其中1架因故障失事)接受国民政府改编的历史性事件。应该说,此一事件的发生并不是偶然的。早在1932年一·二

八淞沪会战前10天,广东空军总司令张惠长就领衔联名发出过“空军誓不参加内战,不再为任何个人工具”^③的通电。同年5月4日,张惠长目睹中日空军战力的悬殊,又在上海电告广东空军全体人员:“广东空军全体同志钧鉴,国家危急,人民方面期请同志努力对外。”^④这些通电和电文,不仅对广东空军飞行人员“北上”接受国民政府的改编起到了鼓动作用,而且也为其后的山西、广西、四川等航空队的统一整编工作起到了示范作用。截止于8·14空战前后,中国空军正式列入编制的有296架飞机,9个大队、35个中队(其中含有5个独立中队)。此外,还有1个笕桥中央航校暂编大队和两个编外飞行中队,约55架飞机。这为把中国空军建设成为一支听命于国民政府统一指挥的,与来势汹汹的日本空军决一死战航空部队,迈出了十分艰难而重要一步。

二

如果说上述举措还只是空中力量建设外在形式整合的话,那么,接下来国民政府的主要精力便放在了旨在提升空军内在战力的指挥体系和战区建设上。

1. 建立适合于战争需要的组织领导体制和指挥体制。

卢沟桥事变前两个月,航空委员会针对日本虎视眈眈的侵略野心,即对全国首次作了空军军区的划分,并首先在南昌成立了第3军区司令部。随后,根据卢沟桥事变后的抗战形势,特别是华东抗战形势的日趋恶化,国民政府为加强对敌作战,很快撤消了空军第3军区司令部,成立了空军前敌总指挥部。同年8月又在南京设立了空军第1军区司令部,划归空军前敌总指挥部统一指挥。不久,因南京战事吃紧,空军第1军区司令部便西迁兰州。在此期间,航空委员会也从南京西迁武汉并进行了大幅度的机构精简工作,裁减虚职人员达1/3,但又相应地成立了空军兵站监部等一些职能部门,负责战时的空军运输补给。从半年来中国空军组织领导体制和指挥体制的不断变化、调整,清楚地透视出当时抗战形势的严峻和中国空军应急作战准备的高效。

在建立空军高层组织领导体制和指挥体制的同时,为适应战争需要,在中西部和西南部地区增设了10多个空军总站、100多个航空站和机场作为空军基层单位。而上述这些地区又恰恰是原各地军阀长期盘踞的地方。所以,国民政府为了消除过去各省航空队的旧有痕迹和恶劣影响,适应战时的统一领导和作战指挥,所有的航空总站、场站和机场都不冠以地名命名,而代以番号,彰显中国空军的空前统一。由此我们有理由认为,在整个抗战期间,中国空军之所以一直都由航空委员会名义统管,而且航委会的

委员长也一直由蒋介石兼任,秘书长一直由宋美龄担任,其目的正是为了强化国民政府对空军统一领导与指挥。

2. 根据战争形势发展适时调整各主要作战方向的兵力。

日军占领南京后,侵华气焰更加嚣张,进而图谋对华南、华东、华中、华北的全面推进。就是说,广州、杭州、武汉、芜湖、合肥、开封、风陵渡、包头等重要城市和铁路沿线,已经成为日军军事进攻的主要方向,并且开始实施对杭州、徐州、安庆、广州、武汉、厦门等地的不间断地空袭和轰炸。

为打击日军更加扩大的侵华战争企图,国民政府适时采取措施,在日军最有可能突破和进犯的作战方向上,加大了航委会对空军战力的调配和使用力度。如,针对徐州、武汉、杭州、厦门、广州、风陵渡、包头等地战事即发的严峻形势,1938年4月至10月,先后在南昌(5月)、广州(4月)、西安(10月)设立了第1、第2、第3路司令部,以分别支援陆军第3、第5战区和第4战区以及第1、第2战区。这样,中国空军的作战和防空管制的区域极为广大,包括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山西、陕西、四川、甘肃等12个省,占国土总面积的1/4。而相对这么大的作战和防空区域,本来就弱小的中国空军又经过8·14空战以来的作战消耗,战斗力大大下降。但与此同时,中国空军借助苏联空军志愿队的帮助,在祖国广大的地域内积极防空、英勇作战,又打出了一个新的局面。这集中反映在保卫武汉的数次空战上。

武汉是战略重镇,又是国民政府抗战指挥机关所在地,日军在武汉地区集结了包括空军在内的大量兵力。1938年5月31日,日本空军再次大规模空袭武汉。日军54架轰炸机和战斗机飞临武汉上空,中苏空军立即出动48架战机迎战,经过艰苦作战,击落敌机14架,而中苏空军只被击落1架(另1架是因飞行员操作失误而坠地的),这是中国空军连续获胜的第3次武汉大空战。接着在6月至10月的武汉大会战中,中国空军同样表现出了极强的战斗力。

武汉会战开始后,中国空军为阻止日军溯江而上,连续出动战机轰炸长江中的敌舰和芜湖、安庆等日军前进机场。仅6月份就炸沉日军各种舰船30余艘,炸毁敌机20余架。7月8日,中国空军又出动战机5批次轰炸日军芜湖、安庆前进机场及湖口舰船,炸毁敌机20余架,重创舰船10余艘。日本空军为了报复,不断地对武汉进行空袭。从7月12日到10月11日,日本空军连续出击、连续轰炸,天空中常常有几十架甚至上百架飞机进行空战,致使日军的空中力量和地面部队付出了巨大代价,从而粉碎了日本企图胁迫国民政府投降的阴谋。

针对日军屡屡空袭兰州这一中国空军抗日物资

的重要补给基地,将兰州空军军区司令部改组为空军路司令部,负责西北方向的空中支援和防空管制。抗战初期,中国包括空军在内的军事物资消耗很大,为了获得外援,1938年3月,苏联同中国签订了5000万美元的贷款协定,向中国提供军事装备。从此兰州不仅成了连接阿拉木图陆上和空中运输作战物资的重要通道和集散地,而且也是苏联外贝加尔湖和中亚地区大批志愿空军人、机接待和加油、检修的最佳基地。正因为如此,兰州也就成了日本空军在西北地区经常轰炸的主要目标之一。对此,王辅在《日本空军再次对我国兰州及西北地区的大轰炸》中有详尽记述。^⑤在这种形势下,为了确保兰州这一中国抗战的生命线地位,航委会遂将1937年西迁于兰州的空军第1军区司令部改组成为空军第4路司令部,加强了西北方向空中作战和防空管制的力量,给日军以沉重打击。此后,日本空军不得不放弃对兰州的轰炸。

各路空军司令部的成立,从组织领导和指挥体制上保证了中国空军作战能力的有效提升,标志着中国空军从此建立起了相对完整的作战指挥体系。

3.关键时刻使用最有战斗力的部队打击日军,鼓舞士气,阻滞日军的大举进攻。

按照装备进行部队编制并在关键时刻调用最强的空中力量抗击日军,这是中国空军在战斗力十分有限的条件下作出的正确选择。

卢沟桥事变后,日军统帅部根据华东作战的需要,于7月11日,迅速将海军编成了“特设航空队”。其中第3舰队对“特设航空队”140架战机的作战使用和攻击目标分配,指向了上海、南京、句容、蚌埠、广德、杭州等地的机场、市区和交通要道。根据这一情况,中国空军除一部分转至华北作应急作战准备外,将大部分主力部队集结于华东地区,以待机歼敌,保卫南京和上海。

1938年8月上旬,淞沪一带战事开始紧张。8月13日,航空委员会发布第一号作战命令,即:除第1大队外的所有8个大队及暂编大队从原驻地火速向指定位置转场并于14日前完成攻击准备。这样就使得淞沪战场之初,中国空军以其集中的190架战机占据了优势。8月13日傍晚,双方发生炮战。14日,中国空军前敌总指挥部下达命令,空军各大队按照战前部署向日军不同目标发起攻击,使侵华日本空军首战惨败。而中国空军越战越勇,每天都频繁地主动出击轰炸上海的日军和日舰,同时也英勇地狙击入侵的日本空军。如此经过3个月的战斗,中国空军就击落日机115架,毙命120多名飞行员,有力地打击了日本空军的嚣张气焰,阻滞了日军的大举进攻。

三

中国空军作为对日空军作战的主要力量,在其

外部整合、内部建设上所实行的一系列做法,对今天人民空军的建设无疑具有重要的历史借鉴作用。具体说,它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要立足国情,在新军事变革中始终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毛泽东在《战争和战略问题》中讲到国民党军队的建立、发展时指出,蒋介石创造了国民党的全盛军事时代,创造了一个庞大的“中央军”并对军队抓得很紧,我们应该向他学习。^⑥虽然毛泽东的这段话带有明显的批判性,但我们从日军大举进攻、民族旦夕危亡的严峻形势看,国民党如果不对仍然处在封建割据状态的四分五裂的航空队进行整合,并通过直接领导来建立统一编制、统一指挥的中央空军,中国的空军就无力应对强大的日本空军的入侵。而反过来说,正是由于国民党通过对各省地方航空队的有序整合和直接领导,才使中国空军具有了前所未有的战斗力,并取得了8·14空战的巨大胜利,才使后来处在困难时期的中国空军得以重振。

在今天新军事变革中,人民空军虽然已经是一支受中国共产党绝对领导的强大的空中战斗力量,但是受美国近10多年来打赢的几场信息化战争的影响,一些人对军队的编制体制和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一系列制度,如党委制、政治委员制和政治机关工作制开始产生怀疑,认为军队现存的编制体制和党委制等不利于未来战场的信息化作战和指挥,提出要取消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权。毛泽东曾深刻指出:由于受根深蒂固的封建割据的影响,中国长期存在着产生军阀主义、山头主义、分裂主义、争个人兵权的深厚土壤,如果对这个问题不引起足够重视的话,我们就会“在兵权问题上患幼稚病,必定得不到一点东西”。“在这点上,孙中山和蒋介石都是我们的先生。”^⑦所以,不管新军事变革和未来信息化战争增加多少科技含量,军事体制编制和指挥系统发生多大变化,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绝不会改变。

2.要针对未来战争特点,积极扎实推进人民空军的信息化建设。

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空军在战争中的地位作用凸显以后,各国军事家都把发展和加强空军力量放在整个军队建设的重要位置。较之更早一些时候,孙中山在《致南洋同志函》(1917年2月20日)中就已经断言,“飞机为近世军用之最大利器”^⑧,并开始着手组建“中山航空队”。然而,由于中国当时正处于各派军阀割据、混战的年代,虽然孙中山的“不败之空军”没有建立起来,但各派军阀却发展和建立了一些航空队,当然,规模与战力自不能与日本空军相提并论。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针对日军的侵略意图,尽管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统一编制体制和统一作战指挥等一系列空军战力的整合性工作,也打赢了8·14空战,不

过最终还是因中日双方总体战力的悬殊而使中国空军失去了制空权,造成了中国军队地面作战的被动。

如果说抗日战争是中国空军的一场恶梦的话,那么20世纪90年代海湾战争以来的几场信息化战争足以让我们惊醒。早在海湾战争硝烟未散的时候,中央军委就敏锐洞察到,现代战争正在成为以空中打击力量为全程使用的高技术战争。指出:空袭在现代高技术战争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已发展成为直接达到战略目的的独立作战样式,首战极有可能成为具有决定意义的较量。为此,空军也自觉确立了未来信息化战争的“主角”意识,决心以新军事变革为契机,大力扎实推进空军的信息化建设,不断加快满足信息化战争需要的新型武器研制和装备的步伐,努力缩短与军事强国特别是个别对我国构成空中打击优势国家的距离。否则,在未来的信息化战争中就会重蹈抗战时期中国空军的覆辙。

3.要明确主要作战方向,以假想敌情作为空军提高训战水平的重要根据。

应该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针对中国的军事准备已经十分明显,尤其根据华北和华东两个进攻方向加大了海、陆军部队航空队的战术技术训练和实战演习的力度。而此时的中国空军,虽然在编制体制上加快了整合步伐,在主要作战方向上也作了一些应急作战的军事准备,如设立“路”司令部等,但由于“力避冲突,以免事态扩大”的消极防御的指导思想作怪,中国空军并没有针对未来作战对象进行战术技术的研练,总结出适宜于自己战力水平的战术、技术和战法,以至于在战争初期,中国空军没有能够在战略指导上采取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不是集中部署,企图与强大的日本空军决战,就是散兵作战,碰到什么打什么,不讲战法战术,常常因与敌担任掩护的战斗机格斗,而放走威胁最大的轰炸机,因而没能起到保护地面目标的作用。可以认为,中国空军的失利,除战机数量少、质量差外,没有形成针对日本空军特点的一套战法技法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毫无疑问,我们所进行的是一场不对称战争,这种情形不仅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许还是。那么在统一祖国大业中,在如何确定主要作战方向,如何打赢外国空军可能介入下的台海地区信息化战争的问题上,人民空军必须进一步加以明确起来,摒弃过去在战争中学习战争的老旧观念和定势做法,有针对性地贴近实战,在现代战法训练中学习战争,使军事训练真正实现由技术层次向战术层次、由演练层次向对抗层次的转变。同时,也要加强现代军事理论研究,不断创新具有我军特色的空战理论,力争在反“台独”军事斗争的重点难点上取得突破,进一步提高人民空军信息化战争的决胜能力。

4.要加强战斗精神培育,把维护祖国领土安全作

为全体空军将士共同的核心价值。

在全民族抗战中,中国空军战斗力虽然薄弱,但在民族危亡之际,广大爱国官兵为了国家的独立与尊严,不畏强敌,奋起抗击,涌现出了高志航、阎海文、任云阁、金雯、曹方震、梁鸿云等数百名战斗英雄。他们那种敢打硬拼、不畏流血牺牲的战斗精神至今仍在激励着人民空军的每一位将士。

然而,烈士的生命和鲜血并没有换来铸剑为犁的时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的这60年里,由世界军事大国或地区军事强国挑起的和由领土争端引发的大大小小的战争仍有数百起之多。就我国而言,虽然从法理的角度台湾作为抗战胜利果实的一部分理应回归于祖国的怀抱,但是由于别国的插手和操控,至今不能和祖国实现统一,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国际关系的日益复杂,台海局势存在着许多变数。在这种形势下,尽管我们表现出和平统一的最大诚意,不过,作为人民空军的广大官兵决不能轻言放弃反“台独”军事斗争准备,包括战斗精神的准备与培育。首先,要用军委关于“最重要、最现实、最紧迫的战略”的指示要求统一官兵思想,对不断变化和发展着的台海局势盯得住、冲得上,不断强化随时起飞作战的临战意识。其次,要用军委“掌握新知识、积累新经验、增长新本领”基本要求,将官兵置于现代战场中查找差距,自觉开掘学习动力,努力提高多谋善断的作战素养。最后,要用立足现有装备打仗、立足与可能介入台海战事的强敌作战的客观现实,激励斗志,牢固确立敢打必胜的赢战信念。

①此时,日本从部队编制上并无独立空军,只有陆军和海军航空队,不过在战场使用上,我们习惯于将其空中力量统称为日本空军。

②1929年9月18日,中华航空协进会第2届全国代表大会就中国空军的未来发展作出了一个宏大规划,即:在6年内建成一支拥有5个整师、9个独立旅以及4000名现役飞行人员和2000架各类各型战斗机,并有效控制全国12个防空区域的空军部队。

③钟锦堂:《广东空军反陈投蒋始末》,见政协广东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委会:《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第90页。

④《航空杂志》第3卷第3期(1932年6月30日),第19~20页。

⑤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部空军史编辑室:《中国空军史料》第2辑。

⑥《毛泽东选集》合订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510~511页。

⑦马毓福:《1908—1949中国军事航空》,航空工业出版社1994年版,第358页。

(作者单位:空军指挥学院政工教研室 北京100097)